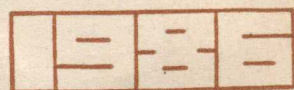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教育学研究

第 4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教 育 学 研 究(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 印张 128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 7201·111 定价: 1.3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合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目次

北京大学变迁忆述	
北大校史一页沧桑	
国立中山大学的过去与现在	
深具潜力、发展迅速	
襟江枕海的中央大学	
浙大今昔	
切合现代医疗需要开办护士学位课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忆往	
革命志士的摇篮——中国公学	
美智诺语言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国的家政教育	
留日学生与满清公使斗法记	
抗战期间的留学教育	
湖北省之职业教育概况（一）	
浙江省教育行政史略（一～六）	
台湾“书院”的沧桑史	
杨花（二首）	

萍客	一
程靖宇	四
詹尊泮	一〇
游训铭	一七
李永刚	二三
宋晞	二六
	二八
陈士廉	二九
江厚塏	三二
	四〇
李才	四一
谢孟雄	四四
林立之	四八
林子勋	五二
吴洽民辑	五五
许绍棣遗著	五六
黄金财	八〇
陈葭芬	六九

北京大學

變遷憶述

萍客

逢五四紀念，憶母校學風

從京師大學堂說起

民國二年筆者考入北京大學，選習法律。當時北大僅分文、理、法、工四科。文、理、工三科皆三年畢業，惟法科獨需四年。每年分爲上下兩學期，每學期大考一次。筆者在校前後歷四年，經過十次考試，每試均俾首列，故於畢業後即得留校授讀，初爲預科講師。及自英游學歸，乃與教授之列。至民國十四年，始離京南下，而去北大。北大者，誠予見聞最切之地。每逢「五四」紀念，人們不免談起北大，茲略語其沿革與變遷。

北京大學之名，民國後始見之。清時只稱爲京師大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之議，爲清德宗（即光緒帝）戊戌新政之一，李端棻侍郎實疏請之。大學堂初無校舍，經清廷撥出北京城內景山馬神廟之四公主府爲校址，由孫家鼐以管學大臣飭匠修理始有規模。四公主府有房三百六十四間，修葺之費，達銀六萬九千三百兩，其事見諸文獻叢編第二十輯。然當時承辦估修之德和木廠之諸主事人，固筆者入學時所嘗見也。

當晚清戊戌時代，全國只有秀才舉貢，並無中學生與高等學堂畢業生，此一京

師大學堂雖應運而生，但於投考入學之大學新生無所取材，在此種情形下，乃先辦仕學院。令進士、舉人或京官先入院受讀，惟以事屬新創，應者寥寥。至於管學大臣職位雖崇，但非專官，其下雖設有總辦、提調諸職，然朝廷擬以差事視之，所以創立初期之京師大學堂遂只如一衙門而已。

首受京師大學堂總辦之任者爲張元濟，但張氏不就；旋改派黃紹箕。而紹箕其時恰又典試出外，遂又另派滿人誠格充任。誠格不諳學務，乃設提調二缺，以朱祖謀、李家駒分任之。學堂課務概統於總教

習，由美國人丁健良任其事，蓋建良時掌同文館，乃使兼之。

至光緒戊戌八月，因康梁變法失敗，慈禧太后盡罷新政，而京師大學堂獨得保留，並派許景澄主其事（許氏曾任駐俄欽差），景澄又聘劉可毅、駱成驥兩狀元為大學教習，至此，大學教育始漸為人所重視。然庚子拳亂事起後，景澄被戮，劉可毅亦為拳衆所殺，京師大學堂罹此劫運，停閉將及兩年。

齊夫稱學生為老爺

直至光緒二十七年張百熙為管學大臣，遂將大學堂併入同文館，辭退美國人丁健良，改聘吳肇甫先生（汝綸）為總教習，而以李希聖、嚴又陵兩先生分任編譯局之責。人才濟濟，學風漸啓。其時曾決定二事：（一）只辦高等學堂；（二）先成立速成科，分「仕學」及「師範」兩館。光緒廿八年，京師大學堂始第一次正式招生。廿九年張文襄（之洞）入京，定學制，設大學堂監督，稱專官。第一任監督張亨嘉，張去以曹廣權暫代，曹去又以李家駒實授。李去易以朱益藩，朱去易以劉廷琛以上諸人，雖皆當時清要之流，然頻年

易督，雲府猶傳舍也。

至宣統二年，始設分科七：經、法、文、格致、農、工、商咸備。學生取材於各省高等學堂及譯學館之畢業生。但經科得以各省所保送之舉人優拔貢入學。是年開學時學生約四百人。至民國二年有一班畢業生，當時畢業者文科（經科附入）九十九人；理科二人；法科廿五人；工科卅七人。其畢業榜示，黃紙標紅，貼於堂內，筆者入學時尚曾親見也。

筆者考入北大，在民國為第一班。若連清未前班計算，則為第二班。其時四科學生，僅得一百六十餘人。齋舍極寬敞，每人佔一宿舍，筆者所居為「卯」字號，每六號宿舍有齋夫（校役）二人，專司水火、飲食、打掃、被褥摺疊、採購諸事。齋夫常呼余等為「老爺」，初極不慣，嗣經追問，乃知亦有掌故在：原來分科學生，皆須先得高等學堂畢業資格。而當時之高等畢業學生，最優等者授內閣中書，優等授主事，中等亦授七品小京官，此等官職，當時皆得稱「老爺」，則予等雖僅大學生，然欲不「老爺」亦不可得也。

蔡元培先生最偉大

猶憶筆者初入校時，校長係由工科學長胡仁源先生兼代，其時文、法、理、工四科各有學長，文科分國文、哲學、英文學、法文學、歷史五門。理科分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四門。法科分政治、法律、經濟三門。工科分土木工程與探礦冶金二門。各科皆許有選科生與旁聽生。當時有日本學生一人，蓋即旁聽生也。

北大校長，自民元以迄民卅七，共歷七人。此即嚴復、馬良、何燏時、胡仁源、蔡元培、蔣夢麟、傅斯年以及胡適諸先生是也。若論建樹大學校風，灌輸自由學派之力，自以蔡元培先生為最偉大。蔡先生於民國五年始來校，而筆者於民六夏間即畢業，薰沐時期雖甚短暫，而景仰追慕，則一生弗衰。蔡先生長校後，首先講究大學生致力之目標，次及於大學校校風之容量，而後兼及於教授治校之制度。其平等博大之精神，後雖有繼，皆弗能及，蔡先生以為：大學本科，學理為重，實用次之故將大學各科先分為甲乙兩部，甲部中分二組：第一組為數學、物理、天文三系；第二組為化學、物理、生物三系。乙部中分三組：第一組為心理學、哲學、教育學三系；第二組為中國文學、英國文學、

法國文學三系；第三組爲經濟、史學、政治學三系。至于法律、農、工、商、醫則概以之歸納於實用方面。又新增美術一門，專授音樂、圖畫、雕刻、建築之學。大學學制，至此燦然。當時新舊文學鬥爭頗烈，而蔡先生容納衆流，使各得本其所長，而競走于學術。當光緒、宣統之間，桐城古文家在大學文科中最佔勢力。法科則東洋留學生握有實權。其後則浙東派之文學，與白話革新派之文學互相鬥爭。法科中則又有歐美法學派逐漸驅去東洋派而奪其席位。

五四以後學風轉際

關於校內集會與發刊之風氣，自蔡元培先生長校後亦告大盛。教授方面之最高組織爲「評議會」，校長雖爲主席，而校務政務之大權，殆取決於多數，蓋民主作風也。學生組織之會，則有「哲學會」、「雄辯會」、「體育會」、「數理研究會」、「技擊會」、「儲蓄銀行」、「消費公社」、「新聞學會」、「新潮雜誌社」種種。教授出版之刊物，計有「新青年雜誌」、「國故論衡」。學生出版之刊物，計有「新潮雜誌」，康白情、傅斯年、羅

家倫等實主之。提倡新文學，打倒孔家店。新舊文學之爭辯，不特在教員方面各有壁壘，即學生中亦隱如敵國。講學風氣，至此爲之一變。

是時文、史、哲各系之教授最稱翹楚，文科國文系中，馬裕藻講音韻，錢玄同講形聲，沈兼士講小學，沈尹默講唐宋詩，黃侃講說文，周作人講新文學，馬叙倫講老莊，胡適講哲學史，張頤講黑格爾哲學，劉和泰（印人）講印度哲學，亦皆特色。史學系中，皆使京外學生聞風趨聽，及今思之，真一時盛集也。但自五四運動

之後，北大學生驚于政治，學風轉際。其後蔡元培先生去任，由蔣夢麟代理，留美學派漸排舊派文學，使難立足，不特辜（鴻銘）、林（琴南）、黃（侃）、劉（師培）或老死或謝聘，即三沈（尹默、士遠、兼士）、三馬（裕藻、衡、叙倫）亦多不能自安。自是門戶之見成，而學術之途窄，非蔡先生當日涵容衆流之本意也。

當民國七八年時，辜、林、黃、劉爲舊派；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爲新派。而民十六年以後，周作人魯迅兄弟及林語堂等相繼來校。「語絲」、「莽原」等刊物遂與「現代評論派」、「獨

立評論派」分爭一席，文學精神又爲之一

變。科學方面，則物理有夏元與李書華，化學有胡狀猷與張貽侗，數學則有馮祖荀、秦汾，地質有丁文江、翁文灝，亦極健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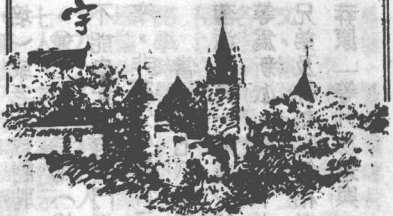
抗戰後予由美返國，雖嘗一蒞母校，顧城郭猶舊，人物已非，所聞異辭，不能盡記矣。

（原載：藝文志〔台〕）

一九八六年二三九期二三—二五頁）

北大校史 一頁滄桑

程靖宇



六月底以前，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派高魯（字曙青，也就是史學家黎東方教授在法國留學時的我國駐法公使，他是留法的老前輩，福建閩侯人，天文學家）接收北京原有的國立大專學校。原北大的物理系主任李書華先生被選為襄助接收人之一。

七月三日國民革命軍將總司令抵達北平，同來者有吳稚暉、戴季陶等人。大約七月二十日（這日期李書華先生在回憶錄——「碩蘆集」中說已記不清楚，但必在中旬），將總司令在北河沿的「北大第三院大禮堂」（即前清「京師大學堂」之「譯學館」，至今外牆角尚有麻石大字脚碑「譯學館」三字存在）向全北平的大學教職員與學生講話。因其時各校都沒有校長，李書華為襄助接收大員之一，便被推為臨時主席，首致歡迎詞，然後由將總司令演講。

今日所稱的「北大」，是指的「國立北京大學」，不是指「國立北平大學」——「北平大學」是北方大學分合之後的產物，簡稱是「平大」（千萬不可誤將這個「平」字解為「平民」）。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中華民國的首都，由「北京」遷都到南京，北京這名字原可以保存下去的，一如明成祖永樂十一年正式由金陵的「應天」北遷至成祖原來燕王所駐的燕京，立都元代的「大都」改稱的「北京」，將「應天」仍保留做「南京」一樣。可是國民政府好像不願意一國有二京，決定將「北京」改回到古代「右北平」的北平——時為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由中央政治會議將「直隸省」改「河北省」；將「北京」改「北平」。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是北京大學校史最重要的一年，比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關係更重要，因為這年是中華民國推翻滿清以後，軍閥造成的混亂的「戰國時期」告一段落的時期。這年六月初，國民革命軍進迫北京，張作霖的「軍政府」在六月三日解體，立刻上火車向關外他的老巢六那時的「奉天」逃去，次日六月四日火車經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有計劃地炸毀，張作霖重傷後不久斃命。

六月二十日便有了上述中央政治會議改河北省名及改「北京」為「北平」的決議。

過了兩個月，九月二十一日，南京國民政府會議，通過了「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在通過這大綱以前，國府早已在先一年（民十六）開始試辦「大學區」制，設了「中央大學區」與浙江大學區，這兩大學兼管江蘇與浙江兩省的教育行政，意在將各省的教育，統屬該大學區之下，今日視之，十分新鮮。

通過這大綱之前，已命令改「京師大學校」（前清的校字是「堂」字，辛亥後改「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為「中華大學」——廣州設「中山大學」；南京設「中央大學」，每大學之上，冠以「中」字。可是在通過「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後，「中華大學」這名字便立刻又不要了，遂改「中華大學」為「北平大學」。（注意：這是以原「北京大學」作核心改的，可稱「前北平大學」，與後來的「國立北平大學」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

這個「北平大學區」的「北平大學」（當然取銷了河北省的教育廳，而以河北省教育行政劃歸這個「北平大學」管理，應毋庸議），以李煜瀛（石曾）為「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後期之「國立平大」之校長是用的最早的北大名教授「三沈二馬」之一沈的吳興沈尹默，行書海內

名家，多年前已在上海逝世），李書華爲副校長——後又兼代校長，因李石曾不常到校視事。

此大學區原定合併前北京國立九校（「北大」不過其一耳）和天津的北洋大學。「北洋大學」的來頭，比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北大」前身的「京師大學堂」還要早三年。它建校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元一八九五年，即甲午中日戰爭次年，馬關條約訂立的那年）的陽曆十月二日。中文名字是「北洋大學堂」（注意：「國立」字眼，是民國總統時興，前清沒有甚麼國立、私立）；外國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稱其正式的英文名字爲TIENTSIN UNIVERSITY。

話說回來，這個大學區制的「北平大學」包括了原有的「北京大學」的第一（文）、二（理）、三（法）院，改爲「北平大學」的文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院；改原北大的「研究所國學所」爲「國學研究所」。

現在麻煩來了，「北京大學學生」爲了要保留自前清京師大學堂成立以來，上氣還接西漢武帝之「太學」，辛亥革命，成立民國，改「京師大學」爲「北京大學」的所謂「北大歷史的特性」，反對分原來的北大爲三個事實上獨立的學院（大學區制，「北平大學」是個總名字，下面有許多許多個「學院」，並非如後來的一個大學內有文、理、法、工、農、醫各學院），決定推舉學生代表南下，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分化北大！」我真佩服八十高齡的李潤章（書華）老校長，他老人家還記得那次學生代表的姓名籍貫，現在我從他的回憶錄抄了下來：

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兩位：（一）李辛之，廣東省人，教育系二年級學生。（二）趙子慈，河北省人，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他們由新北平，浩浩蕩蕩，經天津乘剛直通的津浦鐵路火車，到了浦口。再乘輪過大江至下關，進入了國民政府遷都不久的新首都南京。不及洗塵，便直奔國民政府，正式呈遞了「北京大學學生全體」的請願

書，一方面晉謁首任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和主持過北方大學改制的吳稚暉，當面陳訴，千言萬語，長話短說，總而言之，「北京城」可以改「北平城」，「北京大學」請不要改爲「北平大學」。事關北大是由前清戊戌維新，光緒皇帝三個月內所下的二百多道「上諭」改革中國這個、改革中國那個之中的被慈禧太后在政變時全部勾銷的唯一保留的一道上諭「成立京師大學堂」而成立的。乃我國最高的「太學」——往上數，追溯到西漢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一三六年，中國皇帝始有建元稱年之第五年）置「五經博士」，和元朔五年（一二四年，西元前）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時「太學」（古代「大」、「太」不分，且寫「太」時寫「大」，故「大成」雜誌，實應讀「太成雜誌」才合古音），此其一。

其二，好容易辛亥革命，建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華民國，改「京師大學堂」——全國唯一最高「新學」的大學堂，爲「國立北京大學」，通告了全世界，連人家外國任何大學都只知道有個「北京大學」，豈可隨便因這城池之改名而改大學之名？

其三，民八的「五四運動」，乃是我國的「新文化運動」——比那歐洲的「文藝復興」（西元一三二一年）更俱有「再生」、「復生」的意義，而首倡之者，就是「北京大學」。

其四，其他等等許多理由，從略。

結果呢？吳稚暉先生這次不做劉地地，卻做了一次魯仲連。大拍胸脯，挺身而出，願作調停人，解決這個「名詞上」的糾紛。他和蔡元培兩個，委曲成全了「北大在歷史上的獨立精神」，決將原「北京大學」的「一二三院」，改爲「北大學院」。這名詞仍是爲了「北平大學區制」，即大學區之內，設這麼一個「學院」，給他取個名字叫「北大」，不再設「北平大學文學院」、「法學院」等等。當然這名字並未保留「北京大學」，而只將簡稱的「北大」作了學院的名字；嚴格說，有如香港「中文大學」這名字一樣的不通，或者比「中文」一詞通一點兒。由「北平大學兼代校長」李書華聘請陳大齊爲北大學院院長。（字百年，現在

台灣，多年前香港大學曾贈予榮譽博士學位給他，今已九旬高年矣。）

爲了這事，吳稚暉用「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用箋」的信紙，寫過一封長達七頁的長信給李潤章先生。李先生是有心人，保存了三十六年，於八年前全部製版原件發表在他的自傳式的回憶錄中（按：李潤章先生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京師大學堂創辦時，先生甫八歲，北洋大學成立時，先生週歲）。稚老行書剛勁，得益於篆書之用中鋒，文長不錄，是篇純魯仲連語調之大作。

「大學區制」壽命不長，第二年亦即民國十八年的夏天便撤銷了，於是「北平大學區」的「北平大學」（我稱它「前期平大」），不到一年之「合」，又再「分」了家。這次纔又回復了「北京大學」這個民初的校名。計分爲：

一，國立北京大學——共分文學、理學、法學三個學院。

二，國立師範大學——包括以前的北京男師大，女師大。

三，國立北平大學（我稱他「後期平大」）——除了上開一、二的北大和師大以外，所有以前北京的院校合成，計有「文學院」、「俄文法政學院」、「女子文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等。

四，天津國立北洋工學院——因限於只一學院不得稱「大學」，勝利後才又恢復了歷史最早的「北洋大學」——前清的「堂」字沒有了。

當然河北省教育廳也復活了，管理河北省教育行政。「大學區制」不過一年，且並未正式實行，曇花一現，徒滋紛擾，今日視之，一笑一嘆而已。

由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成立之「京師大學堂」，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之亂，停辦了兩年，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西元一九〇二，辛丑條約訂立之次年）重行開學時設「預備科」與「速成科」——速成科又分「仕學館」與「師範館」。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元一九〇三年）設「譯學館」（後來北河沿

之「第三院」），「醫學館」，「實業館」（今之「理工學院」）三館。

光緒三十年添設「進士館」，速成科的仕學館，也併入到進士館。

宣統元年（己酉，西元一九〇九年）籌備設正式的分科大學，所設之「科」凡八。計有經（此字指「經濟」，民國成立歸入文科，後歸入「法學院」爲「經濟系」）、文、法政、醫、格致（民國的「理」科，後爲「理學院」各系）、農、工、商。

民國成立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就任日期是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已是袁世凱病逝後六個多月了。北大校慶定爲十二月十七日，是用的庚子拳亂後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重新開學的日子，胡適之先生對這個傳統的校慶日，卻不主張再改。真正戊戌創辦京師大學堂的開學日期是：陰曆（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即西元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

胡先生不主張改十二月三日爲北大校慶日，除了因爲「過慣了」十二月十七日的生日以外，似乎並無其他的理由。照校史說，應該是陽曆十二月三日才真。至於上溯兩千多年前之漢代太學，不過是抬高地位的一種「雅意」罷了，不必再拿來講。

戰前指「七七」中日抗戰八年的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上溯至前述的民十八的「大學區制」的撤銷，仍恢復了「北京大學」止。

可惜的是與北大關係極深，且親自參加了民十七「北平大學區制」担任兼校長的李潤章（書華）先生，由民十一至十八，一直在「北大七年」，他的回憶錄也只寫他這七年。民十八後，他去主持「北平研究院」，便不再在北大了，因此民十八後，沒再寫一個字。

比潤章先生早五年到北大教文科的周豈明（作人，魯迅次弟，敵僞時任僞北大校長）的自傳「知堂回想錄」有一章專講他初入北京大學教書的（上冊三一—二頁，第一一〇節「北京大學」）事，他是民國六年丁巳四月一日晚到達北京，四月三日上午訪蔡元培校長未遇，返寓後蔡已有信送到，約次日上午十時來訪（現在的「大學校長」者也，只怕沒一

個有蔡校長這種「下土」的謙德吧？」於是在家等候。因在學期當中到京，只能請周担任點「甚麼預料的國文作文」；十日下午周去辭教國文，且擬不久南歸。這天初次看見陳獨秀、沈尹默，都竭力留他担任教國文，但周卻辭謝了。次日蔡又送信給他，請他担任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月薪一百二十元。（其時袁氏將稱帝，北京中交銀行停止兌現，一元只五六折計。）

這是袁政府爲了省錢，裁撤了「國史館」，改由北大接辦，設這麼一個「處」。袁任大總統時第一任國史館長是由楊度、夏壽田等捧其老師王壬秋（閻運，湘綺先生）出任的，湘綺只到任一下即返湘，再去住了短短一個月便留書辭職，不別而行，時在民二、三年，日記甚詳。知當民六入北大，確實很早，他還有「蔡子民」一、二、三節，以及長達十一節的「北大感舊錄」（周對中共的毫不保留的皮裏陽秋，台北的「傳記文學」曾將周寄在港友人之原信稿製版刊出，爲文介紹過）。但老人寫這「回想錄」時，年已八十歲，其中有不少的地方只「敘事」而不一「定「繫時」」。『戰前的北大』，自民十八至民廿六抗戰的八年，我稱之爲「蔣夢麟時代的北大」，也是「中期胡適之的北大」，因爲在這期間的後五年，胡担任文學院長，也是「早期胡適」以後，胡在國內外名氣最響亮，如日中天的時代。

蔣是從「教育部長」卸任後，出任北大校長的。辛亥後改「北京大學」，民五蔡元培始任校長，三年後暫離京南下，隨後在民八又第二次長校，直到北伐成功民十七改了「大學區制」止，可稱爲「蔡元培時代的北大」。那段時期，是北大成爲自由文化學術領導者的燦爛時期。蔡之用人，無所不包，無所不容。鄙人曾戲稱有的人是上帝派來做大學校長的，前有北大的蔡元培，後有清華的梅貽琦。當蔡回任時，實際上蔡已不到校負責，而是由「代理校長」蔣夢麟（孟鄰）負全責主持校務。蔣是「兼代校長」，其本職是「總務長」，教務長則是顧孟餘（兼俄文系主任）。蔣以兼代而「真除」，一直到抗戰勝利止——不過抗戰時期的

北大，是和清華、南開二校在昆明合組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不用「校長制」，而用委員會制，原校長担任「校委」，即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分任。但聯大實際的校務執行人卻是清華的梅貽琦，蔣雖居昆明，是「對外關係部」長，可能因爲他做過大官的緣故。

至於張伯苓，一因他早在重慶先設立了一個爲「南開中學」分校的南渝中學（此公竟會在中日戰前看準了中日必戰，尤其看準了會連鄰四川重慶，其眼光真令人驚奇），要他經常督導；再則他先做了「參政會」的副議長，後來議長汪精衛忽然離渝飛昆明，再出走安南河內，張又做了正議長。所以長居重慶，少到昆明，但他有手下的大將三人在聯大替三分之一的南開主持大事，倒也放心得下。

西南聯大之大學本科是三大學合一的，但研究院卻仍是各自獨立的，此外遷去時還各有各的學生行政要辦，因此三校仍各設有大學辦事處。我還記得「北大辦事處」就在龍雲的公館那條街——財盛巷（財神巷），大概就是蔣夢麟向「龍老總」租借的公館的一個旁院。

若論「北大」，戰前幾年在北平，蔣雖做得很好，有人叫他「官僚」，但那段時期的行政偏偏極上軌道。可惜的是七七事變前，他們都南去廬山開會，及至事變，未及北歸，北大的「國防」（大學校印），竟留在北平沙灘本校。後來周作人長「僞」北大用的校印，反而是「真」的，而昆明時期在不得不用關防大印時，可能是重新用鋅版或科學方法做成的。到了勝利後，中央派傅斯年去接收僞北大，纔重新將「官印」收了回來。

鄙人對北大由民十八至民廿一年的事情（行政人員分配），手邊無材料可考。最能探聽的人，已不是李潤章先生，而是始終爲蔣夢麟左右手的樊際昌先生——蔣任校長時的「課業長」——即「教務長」的新別名。他是教育系的教授，系主任是那時尚不到三十歲的吳俊升博士。樊先生在台灣，我是知道的。去多去台灣過年，匆匆只十天，想到要見見樊先生，因爲他兒子是我在滙文的中學同學，勝利後在南京還見過一面，本

來是極熱的。但我因時間過短，決定凡清華校友會系統——因「清華校友通訊」辦得第一成功，校友會也辦得活潑的，我稱之為「清華校友系統」的任何關係人——即呀友呀，這回一個也不見，留待下次再說。我只去拜訪了指導我畢業論文的「房師」劉壽民（崇鉉）師。行前之夜，因劉師告知「救命恩人」北大史學師兄李遠先家的電話，試着打通，臨時請他伉儷來華湘參加了晚宴，算是見了第二位師友，因此樊先生無緣重晤。

寫此稿之十日前在一個宴會中，遇見了吳俊升先生，他忽然告訴我：「樊達羽（際昌）也死了，就在梁寒操死的前後兩天。」我又吃一大驚，我想問的北大民十八至廿一年的行政人事情況，已經沒有可詢之人了。

抗戰勝利，「偽」字號全體停工，「偽北大」自不例外。周豈明「偽校長」到南京受審入獄。中央派了在參政會喜歡說話，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有功，而為乃師胡適之博士一再大捧的傅斯年去擔任「北京大學代校長，負責接收偽北大和敵人的文化產業。」

民十八的合而又分之「國立平大」也不再辦了，統統歸入「北京大學」之內，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合」。傅斯年是「代」校長，正式的校長，中央發表了胡適博士。

蔡元培早在戰時作了古，葬在香港——奇的是勝利後的四年，居然沒人得閒想到將蔡校長——這位前清翰林，毅然革命，組織「光復會」，後與中山先生的「興中會」，及黃興的「華興會」三合一，在東京組成了「同盟會」的革命元老新文化的天字第一號的首領的「靈骨」，由大英殖民地的香港，遷回去正式式的「國葬」，或「不國葬」。可見突然勝利後，千頭萬緒，各有所忙，以致許多應「想」到的大事也沒想到，更不用說「做」了。蔡之後，前期——文學改良，白話文運動的北大名教授；中期——擔任文學院長的胡博士，這時順理成章，是最合適，也是唯一的夠格的「戰後北大的校長」。

胡在美國擔任大使卸任後，住在紐約很無聊，勝利了，回來當現成的北大校長，確實沒第二人敢再覬覦。（蔣夢麟戰後又從政，當了宋子文行政院的秘書長。）

傅斯年接收的「北大」，真是一大。計開：①原來北大的文、理、法三學院，即沙灘、馬神廟、公主府的一大片。

②原「北平大學」的工學院（在西城），醫學院附屬醫院，農學院（在皇城以外的「皇莊」——大概原是清帝的田莊之一），俄文法政學院（戰後北大用作「先修班」上課）……

③原東廠胡同的前黎元洪總統官邸——最早是梁中堂（祿）的相府，後為日本人用作甚麼「新民會」等文化侵略站。有頹敗不堪之花園亭榭，院落多到難以計數，足有「紅樓夢」榮國府加大觀園那麼老大。傅代校長將它接收下來，修理了一小小部份，作了胡校長住宅和院長們、部份教授的住家，部份用作名義上的北大研究院和研究室之類。

④日本留在太廟的百萬冊以上的日文書刊，有各種科學的全套雜誌和年報。

他同時還新規劃了戰後北大的組織——計有文、理、法、工、農、醫六學院。校產遍東北三城及西郊皇莊——農學院。人事——自院長至教授、講師、總務、庶務……到「胡校長辦公室」的秘書——傅的同鄉，山東人鄧廣銘（恭三）都安排得一清二楚，整整齊齊，於是電迎胡博士由美到滬，由滬晉京，由京飛平，正式上任。

傅對於北大的人事，原在聯大之「北大人」，和北大傳統的行政掌權大員與絕對屬北大的傳統老教授，不敢輕易革命或奪權，繼續來歸；對原北大的，但抗戰時在川演與他意見不合的人（其實是為國為公，例如在參政會跟他抬過槓的梁實秋，乃戰前北大外文系主任，胡已面允梁「當然回來」，後忽變卦，將梁厲賢去了師大，即是一例），則恕不招待。

胡上任，少不了「演講」，也少不了贏得學生先生的滿堂彩，他依

然是只求其台下聽演講的人喝彩就是了。胡博士一輩子在全世界領了幾個博士學位，演了論千次大大小小的講，寫了最好的許多「上卷書」。說來也怪，他做文學院長，系主任（中國文學系，英文系，哲學系），都很不錯，唯有做了勝利後擴大到空前的北大校長時，卻在一般即算是「愛之者」的「北大人」之間的批評，都認為既不如蔡，又不及蔣。這是甚麼緣故呀？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緣故，胡博士只能作「太平天子」——或「太平總統」。他太怕事；太守他所喜歡的美英式的法，（不是「中國法」——）太避不必要避的嫌疑。校長室的事，由傅斯年安放了鄧廣銘負責，傅雖返南京幹他的史語所所長去了，似乎仍在「遙領北大代校長」，咄咄怪事！

胡不是漢獻帝，這可不應冤枉他；但傅斯年有三五成曹操之才，則是無法遮瞞的事實。胡做校長，用的辦法是一部大機器，反正各部的都有螺絲釘負責就是了。說陳舊點，是寶太后堅持的文景之治，「漢家自有家法」，走的黃老路線；說新一點，是胡博士的過度清明廉正，和遵守尊重北大並不如清華能有的大學議會制度（清華有「評議會」及「教授會」兩個議會，北大從來沒有，也不配有）。

他尊重一個「並沒有議會的北大」的幻想議會，結果是他的校長任內，並未因他做校長，而有任何「胡式」的學術理想出現。

這時期負責的是第一個能幹角色——訓導長陳雪屏。他須應付戰後以北大清華為主左派把持的學生會，幾乎三日一小罷課，五日一大罷課，學生還不時在校外去執行老共陪中的導演，演各色各種的新戲，要對付全校一二百張「壁報」——全是左派主持的刊物。

陳去做官後，（先放長春大學校長，因戰事到不了任，不久即放「青年部長」，去了南京），訓導長改了戰前清華哲學名教授賀麟——黑格爾專家。

秘書長，還是用戰前的鄭天挺——原籍福建的「京油子」，是老北大畢業而永遠在北大把權的，教「明清史」，成就不及孟心史遠甚。

教務長，用了個物理學教授，廣東人鄭華熾，只規規矩矩辦教務的公，沒甚麼不好。

各院則各有院長作主，順帶說一句，戰後北大的農學院長是傅斯年的舅老爺之一的俞大綬——俞大維的弟弟。他是農學家，深慶得人，倒並非傳代校長有何偏見纔請了他來的。

戰後北平的大學生，主持學生會的，當然是「左派」，由於士子的「中立」和傳統的「老子懶得理，甚麼玩意兒」的「不過問」的心理在作怪，這些「中立」者在左派委員們的強力控制下，多數已成了「應聲蟲」和「簽名者」，沒人敢或沒人肯提出「自己的主張」來。

於是「沒有自己的主張者便成了奴才」，左派諸當權學生會的委員幹事們，更得其所哉。這三十多年我注意中共的「新貴」的芳名，不知何以當年的那些由「老八」指揮大賈氣力的北大清華的左派當權的學生會長、委員們，竟無一人「彈冠稱慶」？豈因革命，而必改名換姓歟？抑「走狗烹」了歟？甚以為念。

（原載：藝文志〔台〕一九八五年三三七期三〇——三五頁）

國立中山大學的過去與現在

詹尊泮

一、國立中山大學的由來

國立中山大學，原名爲國立廣東大學，係國父於民國十三年爲培養革命人才所創立；當時國父在廣州任大元帥，命令將國立高等師範、廣東公立法科大學及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三校合併改組而成（註一）。十三年二月四日下令開始籌備，并派鄒魯先生爲籌備主任，同月九日，國父又令籌備主任即日接管上述三校（註二）；其時鄒魯先生原任高等師範校長，奉令後於同年月廿一日就職，正式成立國立廣東大學籌備處，并敦聘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孫科、吳敬恆、胡適、李石曾、王世杰、顧孟餘等三十五人爲籌備員，着手接管上述三校，進行籌備事宜。同年六月九日，國父再正式任命籌備主任鄒魯爲國立廣東大學校長，對該校籌辦及經常費，國父亦一一指定專款劃撥妥當。該校於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正式上課

，但當時尚未舉行開學典禮，直至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才正式舉行成立典禮，故該校校慶日子便確定爲每年十一月十一日。

廣東大學當時分設：文科、法科、理科、農科四個學院，此外尙附設有師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文科三三三人，法科五五八人，理科一七三人，農科二〇七人（以上各科目人數包括本科、預科及專門部門學生在內），附設師範二一八人，中學二五四人，小學六九二人，幼稚園六九人，合計學生二、四九四人。該校校本部設在廣州市文明路（後門臨惠愛東路），亦即高等師範的原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三年一月廿日至一月卅日）即是在文明路該校大禮堂舉行，國父自十三年一月廿七日起至八月廿四日止，亦即在該校大禮堂對三民主義作有系統的一系列演述，故國立廣東大學的原校址，是深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地點。國父於十三年冬北上前，十一月三日特別在

黃埔軍校兩操場召集黃埔軍校和廣東大學兩校學生作先別訓話，開頭的稱呼是：「文學生、武學生！」，於講詞快要結束時，又特別指着廣東大學的學生說：「廣東大學的文學生，今日也是不遠數十里來黃埔聽革命的演說，研究革命的方法，對於革命的前途，也當然是很希望成功的。」由此可見，國父對廣東大學的重視和期望的殷功。於廣東大學正式成立典禮時，國父因準備北上事宜（註：國父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上），未克親臨致訓，特頒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訓詞，這也即該校校訓的來源（註三）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不幸病逝於北京，同年三月三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一次會議決議：特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爲國立中山大學，用示永久紀念。國父之豐功偉績及其創立廣東大學之苦心。但因當時政治局勢動盪及軍事行動緊迫之秋，當局未暇顧及於此，尤以蘇俄顧問鮑羅廷及其黨內共黨份子，對鄒魯校長之堅決反共立場深爲不滿，致該決議案遲遲未獲付於實施；而鄒魯校長亦於十四年九月被迫離粵北上，嗣而辭卸廣東大學校長職務，十二月陳公博任代理校長，十五年三月褚民誼繼任校長

，十五年夏中央另派戴傳賢（季陶）爲廣東大學校長，但戴氏當時正臥病湖州，暫由經亨頤代理，至九月間才抵達廣州，而國民政府已於十五年七月正式命令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爲國立中山大學矣。戴氏呈准中央，將校長制改爲委員會制，以戴傳賢爲委員長，顧孟餘爲副委員長，徐謙、丁惟汾、朱家驊爲委員，十月十七日委員會正式成立；時校中黨派紛爭，風潮屢起，中央乃明令整頓，停課半年，重訂一切規章，學生一律甄試，教職員一律停職另任，期以革命手段做根本改造（註四）。

十六年三月復課時，學生風習果然漸趨正軌，研究學術興趣亦日見濃厚。同年六月又恢復校長制，以戴傳賢爲校長，朱家驊副之，中山大學從此走上坦途，日趨茁壯！（註五）

在此，尚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進展，各地均紛紛想成立中山大學，十六年七月乃將在廣州之原來國立中山大學改稱爲「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在武漢成立「國立第二中山大學」，在河南成立「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在南京成立「國立第四中山大學」，但沒有幾個月，至十七年二月，又將廣州之「國立第一中山大學」之「第一」字樣

取銷，恢復爲全國唯一之「國立中山大學」，並將武漢、河南、南京之三間中山大學分別改換其他名稱了（註六）。由此，亦足見中央對由國父手創之廣東大學改名爲中山大學之特別重視，和其所具有之特殊意義，正符「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古訓。

二、國立中山大學的發展

（一）各學院及各科研究所陸續增設
前面說過，國立中山大學是由國父所手創的國立廣東大學改組而成，民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廣東大學正式成立時，大學部（包括預科）只有文法、理、農四科學院，至民十四年七月，中央復命令將廣東公立醫科大學併入（註七），成爲該校的醫科，及十五年八月，又奉令接收廣東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成爲該校的工業專門部；故國立中山大學正式成立時，實已共有文、法、理、農、醫、工六科，其規模之龐大，當時在國內已鮮有匹，尤以醫科採德國制，教學甚爲嚴格，聲譽日著。更有進者，該校性質特殊，其所訂之大學規程第一章第二條：「國立中山大學之前身國立廣東大學，既係孫中山先生講演三民主義及其他要義之所，又係中山先生手創經營，更奉國民政府命令設置，以黨化教育樹建設之基礎。故今確定宗旨，務以國民革命之精神，振興國民智力之開展。一方揮弘列種科學藝術，以備國人之享受，一方揮弘教育之黨化，以堅革命之工作。務使他國學院與社會隔閡之弊，而成精神與學業爲一致之方。」此種溝通學校與社會，主義與學術，讀書與救國之教育宗旨，亦惟中山大學有之（註八）。

民十六年五月起，醫科、文科、理科、工科各研究所陸續設置成立，十七年并增設理化師範部，十八年春，又接收兩廣地質調查所，三月成立天文台；同年九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又決議：於校長之外，該校另組織大學董事會，共負大學建設發展之責，并任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宋子文、古應芬、孫科、陳銘樞、朱家驊、戴傳賢九人爲董事，以戴傳賢爲董事長。國立大學之設董事會，以此爲創舉，亦足徵中央對中山大學特別重視之一般（註九）。

民十九年九月，戴傳賢校長辭職，由朱家驊繼任；是年十二月，朱家驊調長中央大學，許崇清接任校長。增設土木工程與化學工程二學系於理學院，改稱爲理工

學院；廢止預科，設高中部，分甲乙兩部，原來附中則改稱附屬部中。二十一年，許崇清去任，鄒魯重任校長。在這裡需要補充一提的是：民十五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名義上雖然是戴傳賢為校長，但戴氏在中樞另有任務，中山大學校務，實際上多由朱家驊負責推行。

(二)石牌新校建築宏偉，校區遼闊，規模宏大

國立中山大學的規模雖然已告完備，從研究所而大學部、專門部、高中部，從附屬部中，小學而幼稚園，以及附屬醫院、農場、天文台、地質調查所、編譯館等，可說是洋洋大觀；惜校舍分散，且大多數位居市區，不適修學，國父於民十三年創立國立廣東大學（即中山大學前身）時，即指定白雲山麓石牌鄉為新校址，計土地約一萬畝，但以工程浩大，且因政治軍事情勢等緣故，遲遲未克實現。二十一年春鄒魯重長校務後，即積極從事新校建築事宜，三月訂定建築新校之「六年計劃」，分三期籌建，每期預定二年，共需經費二十萬元。八月重組工學院籌備委員會（註：原工科併於理學院內，稱理工學院），九月增設農業專修科，十月接管廣東土壤調查所，十一月接管廣東通志館；廿

二年一月舉行建築新校大募捐，三月第一期工程開始，十一月舉行國父銅像揭幕典禮，二十三年八月成立工學院，分設土木工程、化學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四學系，九月新校第一期工程先後完成，共僅費時一年又半，農、工、理（理科學一部份）三學院遷往新校上課，男生宿舍六座、女生宿舍一座、膳堂二座、及其他零星附屬工程及公路七十餘里亦同時完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山大學十週年校慶紀念時，并同时舉行新校落成農工理三學院遷校及文法兩學院奠基典禮。鄒魯校長當時曾作「國立中山大學新校雜詩」共五十首誌盛。（註十一）

第二期工程，則由民廿三秋起至民廿四年秋止，僅費時一年竣工，完成主要建築物十有：文學院金座、法學院金座、理學院的數學天文物理教室一座、生物地質地理教室一座、工學院的化學工程教室一座、農學院的農林化學館一座和大大附屬建築物五座，另工廠數座、宿舍數座、處燈廠一廠、自來水廠一座，增築公路五十餘里。文法兩學院全部及理工兩學院剩餘班級亦悉數遷入新校上課，至此，文、法、理、工、農五學院均集中新校址，學生亦全部住宿校內，新校規模已告粗備點（

註：醫學院仍照在廣州近郊東山原址）。在此，尚便補充的是：二十四年五月，奉教育部令核准該校成立研究院，內分文科、農科、教育三個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分中國語言文學及歷史兩部，農科研究所分農林植物學及土壤學兩部，教育研究所分教育學及教育心理學兩部。校內原有之文史、教育、農林植物三研究所，及廣東土壤調查所，均依類歸附於研究院內，院長照章由校長兼任，規模益見擴大。

至于第三期工程，開始于民廿四年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撥了壹百萬元，工程進行更為順利，約年餘時間，已完工的主要建物計有：木工實習工場一座、鍛冶鍛金實習工場一座、研究院一座、天文台一座、圖書館一座、體育館一座、教職員宿舍一座、教職員食堂一座、教職員家屬住宅大小四十六幢。至計劃中的其他建築，則因時局日趨緊張，而漸告停工。卅六年秋起，且因日機轟炸關係，部份院系暫遷回市區文明路上課矣。（註十二）

綜觀新校舍的形勢，白雲山環其側，珠江繞其前，校內岡巒起伏、池沼盪漾，各建築物分佈於岡巒之上或山腰水涯，錯落有序。禮堂於中間，文學院在其左，法學院在其右，農學院在其北，理學院位於

東南，工學院位于西南，五院排列有如鐘形（註十三）；國父銅像在其南，銅像東爲圖書館，銅像西爲博物館，禮堂東南高峯爲天文台，其西南則爲大門牌坊，其他房舍則散居各處。各大建築物均爲宮殿式，紅磚綠瓦，高大圓柱，瑰麗堂皇；除建築物外，到處都是農場、林場、菜園和花園，眞像人間仙境。學生藏修其間，受着四周環境的陶冶，胸襟自會開闊遠大。而全校分區劃段，均用我國諸行省的省名，各岡壑池沼，亦沿用各行省名山勝湖的名字，各高岡或道路要點，並樹立教育性標語大字牌，足之所履，目之所及，凡屬到該校的人，不僅員生，都會與其悠然愛國之心。尤其校區遼闊，校舍宏偉，不僅國內鮮有其匹，即國外亦不多見。更爲難得的，是該校自給自足計劃，所有農場、林場、菜園、園藝、畜牧等，預計十年之後，收入足敷該校支出，使消費的教育，化爲生產的教育，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註十四）

三、國立中山大學遭受二次

的浩劫

（一）抗戰時三遷，備嘗顛沛流亡之苦
可惜好景不常，石牌新校舍剛建築完成，抗日戰爭爆發，倭寇默跡南侵，國立

中山大學於廿七年秋間，不得不倉皇西遷；遷離之前，夏間尙奉令接收國立廣東法科學院及廣東省立勸業大學工學院，并增設師範學院。臨時校址，暫定雲南激江，間關折道，長途跋涉，圖書儀器搶運離穗之初尙有八成以上，惜沿途輾轉運搬，損失不少，所幸員生能全部成行，未遭傷亡。廣州不幸於廿七年十月陷落，石牌大好新校舍，備遭敵寇蹂躪，言及痛心；該校於廿八年三月一日始在激江復課。廿九年春，滇南物價暴漲，生活程度日高，員生生活頗感困難。六月間，鄒魯校長因病滯激，中樞派許崇清代理校長，以粵北爲抗戰基地，環境尙稱安定，乃主持遷校搬回粵北。各院部分配地點計爲：校長部總辦公處，研究院及增設之先修班，均設坪石鎮；文、理、工三學院，分設於坪石附近之鐵嶺、塘石、三星坪等地；醫學院設於樂昌縣城；法學院設於武陽司，師範學院設於管埠，均屬乳源縣境；農學院則設於湖南宜章之栗源堡。計議妥當，開始行動，至三十年一月先後在上述地點上課。三十年七月，張雲代理校長職務，九月成立師範學院初級部及附屬中學；一年級新生部遷武陽司，而法學院則移於車田壩。三十一年五月，教育部復派金曾澄代理校長

，學校內部組織，亦略有更改，校舍亦略有擴充。但三十四年一月，粵北警報頻傳，坪石告急，乳源縣境之管埠、梅花等地，亦被敵騎竄擾，該校各部門倉猝間分別向梅縣、蕉嶺、五華、龍川、興寧、連縣等地遷移，這即中山大學抗戰期間的三遷。

抗戰勝利，該校於卅四年九月、十月間先後返回穗市，惜石牌校舍原被南侵日軍司令部所據，破壞甚多，滿目瘡痍，經兩閱月的整理清除，十二月十四日才正式上課。校本部、研究院、文理法農工師範大學院暨天文台均在石牌，醫學院仍在東山百子路原址，先修班及師院附屬中學，則在文明路舊校址。十二月廿一日，王星拱接任校長，繼續整頓，添充設備，至卅五年春，始略恢復舊觀。卅七年六月王星拱辭職，中央派張雲接任，張未回國前，由陳可忠代理；十月張氏辭職，陳氏真除校長。（註十五）

（二）大陸淪沉，中山大學陷入共匪魔掌

共匪倡亂，華北華中戰禍頻仍，三十四年，匪謀學生曾乘機發動罷課遊行，幸該校事先防範得宜，及時制止而平息。三十八年三、四月間，部分教授因物價不斷高漲，要求調整薪津，而有罷教之事，不